

为什么读书和为什么打麻将

林少华

先说句题外话。我有个在东北老家当农民的弟弟。也许你不相信,哥哥是教授弟弟会是农民?可他的确是农民,一如我的确是教授。在这点上,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不能不承认教育的局限性。一母同胞,同样的基因,同样的家庭环境。上学又上的是同一所小学,任课老师也几乎相同——教完我的老师教他。可你说怪不怪,他做什么都比我聪明,就是学习比不上我。而且他压根儿不想学,小学四年没读完就宁肯干农活去了。怪谁呢?怪什么呢?一个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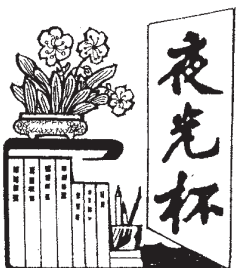
不过我喜欢这个农民弟弟,哥俩儿相当要好。今春老家(长春市九台区)疫情特别严重,我担心误了农时。好在他刚一允许出村就跑去我的“山居”种瓜种豆种花种树,前不久我回来,但见窗前屋后花花绿绿一派生机。他有两个喜好,一是喝小酒,二是打麻将。喝小酒有时哥俩儿一起来两盅。打麻将一起不来,我不会,还不时劝他少打,最好别打。他住在离我不很远的村庄,隔几天就跑来一次。有时一闪瞧见他进门了,正看书的我才放下书。一次他问我为什么老看书,书就那么简单有意思?我反问他:你为什么老打麻将,打麻将就那么简单有意思?他说不打麻将干什么,挂锄了没活儿可干。我说不看书干什么,放假了没课可上。

这样的对话哥俩儿不止对了一次。可以说,我并没有“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”的优越感,也没有歧视打麻将的意思。而是把阅读和打麻将同样看成一种消遣方式,一种娱乐活动。正如弟弟除了打麻将不知干什么好,我除了看书也不知干什么好。也就是说,打麻将和看书成了我们的生命存在状态本身。不打麻将,不看书,就意味着换作另一个人活着。而那怎么可能呢?过去搞了不少运动要求改造思想、改造世界观,而一旦运动不搞了,大家就都故态复萌,重操旧业,琢磨数学的还是琢磨数学,鼓捣哲学的还是鼓捣哲学,喜欢外语的还是喜欢外语。

说回看书和打麻将。自不待言,即使看书和打麻将同是消遣、同是娱乐,那也还是有区别的。一个是成本区别。口袋里没钱是不敢坐在那里的。相比之下,一本书才多少钱?何况一本书可以消遣好几天。读书即使不是门槛最低的高贵,也是成本最低的消遣。第二个区别是健康方面的。打麻将一般都要正襟危坐,神经绷得紧紧的,两眼盯得直直的,而且连续作战。听说曾有麻友怕跑了手气而轻易不敢去卫生间,结果一下子把膀胱憋爆了。总之影响健康。而看书就随便多了,躺着歪着看、吃着喝着看均无不可。看一会儿放下书,望一会儿远山近岭红花绿树或半轮明月满天星斗,甚或哼一支小曲唱一段越剧也悉听尊便。据说喜欢看书的人相对长寿,道理就在这里。

第三个区别呢,是心情上的。打麻将,即使赢了,得到的快乐也大约是功利性的、官能性质的。而读书带来的快乐,则是由心底静静涌起的超越功利性的快乐,“每有会意,便欣喜忘食”。一次给研究生上课,我说一个人如果不懂宋词之美,那可真是赔大了,损失大了。这是因为,宋词在表现微茫的情绪、在将微茫的情绪化作语言审美、纸上审美方面,可以说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,出神入化,曲尽其妙,而且具有现代性——现代人常有的小纠结、小郁闷、小感伤、小孤独、小惆怅等种种微妙渺茫的情绪在宋词中都有表现,给人以莫可言喻的审美愉悦。

为了避免误会,最后我要再强调一句,我并不歧视打麻将。不过若能把打麻将和看书结合起来,那真是再好不过。以前的张恨水、徐志摩、梁启超就是这方面再好不过的例子。他们既是为文高手,妙笔生花,又是麻将高手,妙手回春。文友书友麻友,齐头并进,相映生辉。请听梁启超那句名言:“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麻将,只有打麻将可以忘记读书”,可见二者可以完美地共存于、和谐于同一人身上。一会儿大弟弟来我要让他带我去麻将桌见习见习,下一篇专写打麻将。一言为定!



夜光杯

出宇治JR站,步入街区,各种茶铺栉比鳞次。简朴精致的店铺装饰,呈现古老安静的气息。经营多为茶叶和茶点,抹茶的嫩绿色和弥漫的茶香,很让人流连。

街上多家茶铺有百年以上历史。创店四百多年的三星园,据说其茶师曾被将军家御用。中村藤吉、伊藤久右卫门、福寿园宇治工房、通圆茶屋、辻利店等也很著名。平等院附近的上林纪念馆让我驻足良久。曾经的主人上林春松是皇宫和幕府御用茶师,现在这里被修建为茶叶纪念馆,记录了宇治茶的历史。

宇治川河畔曾经山路崎岖、交通不便,宇治川成了从京都南部、奈良北部进入瀬户内海的交通要道。现今沿河修建了公路,而河川的重要对整个京都地区仍至关重要。河面宽广,浅蓝色的流水湍急,却不见浪花溅起,河水很深。两岸山岭起伏,背山临河而筑的民居安宁而有历史感。树林,偶尔驶过的车辆,缓缓行走的路人,薄雾绕山缓缓浮移……我喜欢这样的氛围。

一座橘红色大桥横跨宇治川,十分醒目。取名“朝雾”让我想象联翩。宇治,日本的茶乡,河两侧山岭间的连片茶园,既有河水的滋润,又有朝雾甘露般的恩泽,生态环境是多么的得天独厚!

中午,在“福寿园宇治茶馆”用茶餐。

1889年5月5日,清廷发布了一道上谕,内称铁路“为自强要策,必应通筹天下全局……但冀有益于国,无损于民,定一当不易之策,即可毅然兴办,毋庸筑室道谋”。这也被视为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宣布兴办铁路。

上面既有号召,下面当然要响应。于是就有了1889年8月26日,海军衙门上奏清廷,请以西洋各国为借鉴,结合本国实际情况,提出兴办铁路的具体政策。其中特别提出,应“简派公正廉明熟悉洋务之重臣,招集公司,严定章程,妥为经画”。“内外一心,官商合力”。次日,清廷发布上谕,均照所请。

疯狂的津浦线

这就是说,清政府同意官商合办建铁路,并支持选派公正廉洁的官员参与其事。事实证明,强调后一点很重要,因为单凭绅商经济实力显然不够,而且其上层与朝廷有密切联系,这些主事部门免不了会出现浮支浪费、贪污中饱等现象。清廷也正好以此为口实,主张铁路还是以官办为宜。如《光绪朝东华录》记载的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五月一道上谕就说:“近年各省官办铁路,皆能克期竣工,成效昭著;而绅商集股请设公司,奏办有年,多无起色,坐失大利,尤碍交通。”其实这里说的并不是事实。且不论其他,就以津浦铁路建设工

陆其国

暑月杂咏·台风歌

秦史枏

蝉语鸟歌苍穹黑,虎啸龙吟灰墨墨。
霜雨推山发浪声,威风翻海同天色。
传言世上少仙乡,怎似人间多鬼国?
摧日压城假李生,持旗健勇真苏轼。
吾闻天籁出泉渊,岂料涛云卷南北。
娇果纷纷落白花,珍禽齐齐垂长翼。
乡邻援手闭门窗,野外歌声皆闻默。
塞耳佯装入醉眠,黎明清梦已难得。

座,一声招呼未打,步行回到南区宿舍区,十八号楼下的阿姨看到我惊讶地说:这么早回来啦?我于是又转身,漫无目的,穿越树影和球网,来到煤渣跑道上。

往日,跑道上总有人跑步、散步,旁边篮球场排球场上总有人跳跃摆动,此刻大家都去吃毕业饭了吧,寂无旁人,但我并不害怕。

夜风吹过旗杆

马 衣

走累了,坐累了,索性躺平,仰望夜空。那一夜的天空被淡淡云气笼罩,视力所及只有寥寥几颗星子,有一霎,我觉得自己被地面轻轻抬了起来,飞到了空中,高空流云从脸旁滑过。之前因为激动、流泪、唱歌和饮酒而急躁的心情渐渐平复下来,心跳放慢了节奏,呼吸平稳,元神归位,也不感到那么热了。后半夜开始起风,微风吹动旗杆上的缆绳,缆绳撞击在杆上,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,那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温柔的告别的声音。恍惚间,旗杆变身桅杆,仿佛钟声响起。大家爱唱的那首《光辉岁月》就是这么开头的:“钟声响起归家的讯号……”

福寿园宇治茶工房于1790年创建,历史悠久。喫茶馆位于宇治川边,两层的建筑,黛瓦白墙,周边绿树簇拥,环境幽静。

宇治茶最早起源于日本镰仓时代,后来,室町时代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在宇治开辟茶园,生产抹茶、玉露茶和煎茶。

在宇治感受唐宋茶韵

楼耀福

抹茶源于中国隋朝,兴于唐朝,盛于宋朝。唐代诗人卢仝“碧云引风吹不断,白花浮光凝碗面”的诗句,对抹茶泡沫形状和色泽作了精湛描述。明代以来,中国流行冲泡饮茶,抹茶茶道渐渐失传。相反,九世纪末,日本遣唐使从中国引进抹茶,得到了发扬光大。刘禹锡诗句中的“今宵更有湘江月,照出菲菲满碗花”的意境,如今我在宇治得到了体会。

玉露茶的珍贵,似乎在抽枝发芽的那一刻就已注定。新芽初绽时,日本茶农会用稻草搭起棚顶,遮挡阳光,小心保护茶树,使茶树柔软的新芽不受灼伤。这一工艺在日本被称为“覆下”。之后将嫩芽采下,高温蒸汽杀青,急速冷却,再揉成细长的茶叶。

这种以蒸汽杀青的绿茶工艺,最早也源自中国。陆羽在《茶经》中记载:“晴,采之。

蒸之,捣之,拍之,焙之,穿之,封之,茶之干矣。”中国比较完整地用蒸汽杀青的绿茶,最有代表性的是恩施玉露。恩施玉露条索紧细、圆直,外形白毫显露,色泽苍翠润绿,形如松针,汤色清澈明亮,香气清鲜,滋味醇爽,叶底嫩绿匀整。1965年被评为“中国十大名茶”。日本玉露茶与恩施玉露在工艺上有渊源关系。

一一品尝抹茶、玉露茶之后,我在喫茶馆上下两层参观,旧时的茶缸,墙上贴着几代人的家训以及严谨的制茶工艺流程,老窑所烧制的茶器,一台台昔日手工制茶的设备……像小型博物馆。目睹着这些器物 and 图解,我感受到茶在福寿园的传承和在宇治的久远。

类似福寿园喫茶馆这样的茶室在宇治到处可见,在幽雅的环境中喝一口抹茶和玉露,我在寻觅唐宋时代品茶的感受,有时穿越的美好。宇治空气中仍弥漫着抹茶和玉露那翠绿的甜香气息,应该感谢很多年前两度入宋的日本高僧千光荣西。是荣西在平户岛播种从中国带回的茶籽,之后又将茶籽赠送给京都的明惠上人。明惠上人在宇治大面积种茶,开创了宇治茶的历史。正是荣西的传播,今天我仍可在宇治看到中国茶唐宋时期的光泽和延续的精髓。



有风的日子

(油画)

杨洋

程来说,其中官员贪污腐败现象就很触目惊心。

津浦铁路由天津至南京浦口,全长一千零十公里左右,是连接南北交通的重要干线。工程分南北两段进行,分设南北两个总局,分别于1908年8月、1909年1月相继在天津、浦口举行开工典礼。此前1908年1月13日,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与德华银行、华中铁路有限公司(1904年由中英银公司和福公司合并而成)签订了《天津浦口铁路借款合同》,共借款五百万英镑。但开工不足两年,即发现工程款不敷支用,于是又向英、德借款三百万英

镑。追加额超过一半,达五分之三强,这“不敷支用”显见太过夸张。真是不查则罢,一查吓一跳,说官办铁路中的吏治腐败远甚于商办,这决非虚言。且说津浦铁路工程上马后,直隶总督杨士骧荐举商约大臣吕海寰出任津浦铁路督办大臣,山东巡抚孙宝琦为帮办大臣,罗致了一批官员和商人。1909年5月,杨士骧病故,军机大臣那桐代理直隶总督。时有都察院给事中高润生奏参吕海寰等,容隐私人,败坏路局。清廷命那桐确查。于是就有了《宣统政纪》(卷十六)

记载的1909年8月2日谕内阁:“兹据查明覆奏,津浦路局总办记名道员李德顺,乘便营私,不顾大局,激动公愤,清议不容;候选道张谡,阿附逢迎,卑污无耻,蝇营狗苟,有玷官箴,均著革职,永不叙用。候选道曹嘉祥善于营运,结交官府,惟利是图,著即革职;分省知县朱祺,倚势凌人,赃私累著,著革职永不叙用,并发往军台效力赎罪……吕海寰身为督办,于一切支款用人,事前既不能防范,事后又失于觉察,著交部议处。帮办大臣孙宝琦,视事未久,知有弊端,告知前督将李顺德撤差,尚未始终受其蒙蔽,著毋庸议。前直隶总督杨士骧,既失知人之明,难辞监保之咎,著撤销太子太保衔。寻吏部议奏,吕海寰应得降二级调用处。”



这件谕内阁揭示的几呈包罗万象态势的官员犯罪现象,只要一剖析隐藏在诸如“乘便营私”、“阿附逢迎”、“惟利是图”、“贪婪悖悖”;或者“借地纳贿”、“奔竟营谋”等背后的官场黑幕,相信都足以凸显骇人听闻的津浦线铁路工程中的腐败乱象。这就是津浦线的疯狂!不难想象,沿着这样的轨道,国家会驶向哪里,应该不言而喻。

事实上海津浦线的疯狂,恰成了腐败的清王朝加速驶向不归路的一个绝妙隐喻。

暖在心里的一抹光,请看日本栏。

十日谈

那年,我毕业了
责编:郭影